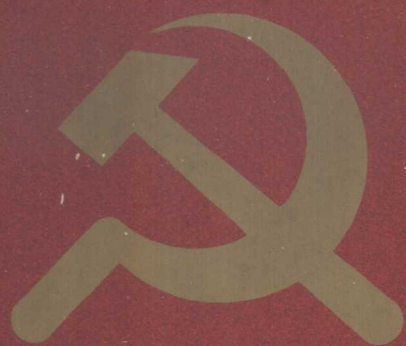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人物傳

凍原

精选本
10

编委会主任 李力安

主编 陈志凌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

第十卷·统战篇、国际友人篇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编

编委会主任：李力安

主 编：陈志凌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顾 问

习仲勋	肖 克	杨成武	马文瑞	邓力群
段君毅	赵南起	李葆华	穆 青	吴 仪
邵华泽	刘纪原	徐光春		

编委会副主任

李铁林	刘云山	徐文伯	陈 虹	桂晓风
热 地	舒惠国	林开欽	何光晔	朱新民
朱佳木	王重农	尚 文	赵培义	李 岩
魏久明	王 淇			

副主 编

郑建英	杨瑞广	姜华宣	吴殿尧
-----	-----	-----	-----

编 委

马洪武	王 良	王性初	王永仁	邓 斌
冯树成	吕芳文	阎景堂	朱成贵	朱敏彦
李宏塔	杨世兰	吴家林	陈弘君	高三山
郭洛夫	周垂远	黄 玲	黄 瑶	蒋建农
程韶韵	翟作君	戴知贤	刘勉玉	张广立
郑洪泉	雷 厉	张国良	温厚文	贺 扬
管景臣	宋毅军	赵俊清	宋 霖	陈瑞云
蒋伯英	王江松			

目 录

统 战 篇

王昆仑	(1)
邓演达	(36)
冯玉祥	(79)
朱学范	(154)
朱蕴山	(197)
许德珩	(219)
杜斌丞	(246)
李济深	(272)
杨杏佛	(290)
何香凝	(301)
沈钧儒	(348)
张 澜	(406)
张治中	(445)
邵力子	(475)
陈嘉庚	(499)
周叔弢	(514)
胡厥文	(531)

高崇民	(553)
黄炎培	(575)
章士钊	(606)
楚图南	(643)
廖仲恺	(668)
谭平山	(701)

国际友人篇

马 林	(734)
白求恩	(747)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777)
加 伦	(799)
汉斯·希伯	(809)
罗 易	(824)
罗生特	(841)
罗明那兹	(863)
柯棣华	(881)
埃德加·斯诺	(899)
维经斯基	(928)
鲍罗廷	(956)

王昆仑

崇庆余

编撰者话 王昆仑,20年代初经孙中山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后,思想上与国民党当局彻底决裂,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利用特殊身份积极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开展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活动;建国初任政务院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兼北京市副市长,“文革”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民革中央主席。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诗人、红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投身革命

1902年8月7日,王昆仑出生于直属省(今河北省)宝坻县。父亲王心如少年时代“好读书,涉猎渊博,急公好义,乡里称贤”^①。母亲侯受真,知书达理,深明大义,乐于助人。王昆仑少年时代是在北京度过的,六岁上小学,1914年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北京的正志中学,第二年夏又改考入北京四中。

1917年夏,中学毕业,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当年,蔡元培出任北

① 见太湖七十峰山馆的《王心如暨夫人侯受真碑文》。

大校长,对教育进行整顿和改革,聘请了一批具有革新思想而又知识渊博的人物到北大任教。王昆仑在名师影响和新文化运动激励下,吸取各种新知识、新思想,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1919年秋,王昆仑从北大预科升入本科。第一年他主修文字学,老师是钱玄同。1920年秋,他转入哲学系。他听过李大钊、杨昌济、马叙伦等教授的哲学课,也听过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课。这些课都给王昆仑以很大的影响。

1923年初,他在北大参与发起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彭允彝为教育总长的斗争。上街演讲,张贴“打倒军阀”、“否认国会”等标语。为了寻求上海各界的支持,王昆仑、黄日葵等四人前往上海,并拜访了孙中山,向孙中山汇报了北京学生驱彭斗争的情况,希望他给予指导和支持。孙中山对他们说:“彭允彝的问题,不只是教育界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光反对彭允彝一个人很不够,要反对他的主子曹锟、吴佩孚,还要反对曹、吴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列强。你们的斗争,也不是北京一个地方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斗争。”^①过了几天,王昆仑又一次拜访孙中山。孙中山告诉他:“要革命要救国,就要相信我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就要参加一个革命党,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孙中山还特地介绍王昆仑到环龙路号国民党机关,履行了入党手续^②。

王昆仑从上海回到北京后,一面在北大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国民党支部,进行反军阀的斗争;一面深入研究先秦哲学,写出了毕业论文《荀卿考》,受到了老师与同学们的好评。1923年,他从北大哲学系毕业。

同年秋,王昆仑应邀到天津南开学校(包括大学和中学)任中学国文教员。当时南开学校集中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和优秀学生,学术空气浓厚。老舍、范文澜等人都在该校任教,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的曹禺曾是王昆仑的学生。

① 王昆仑:《宋庆龄——毕生为新中国奋斗的忠诚战士》,《王昆仑文集》,团结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05-306页。

② 王昆仑:《宋庆龄——毕生为新中国奋斗的忠诚战士》,《王昆仑文集》,团结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06页。

1924年春开始,王昆仑在北京两级女中(即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任国文教员。在这里,他边教书边进行革命活动,跟当时北大的进步学生孙晓村、共产党员黄日葵(时任共青团北京地委书记)等人均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并参与国民党北京地方组织的活动。在此期间,他系统地研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五权宪法,对孙中山著作的基本内容有了比较熟悉的了解。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抱病北上,于12月底抵京后下榻于铁狮子胡同五号,并在住地设立了临时办公处。王昆仑成为该办公处的工作人员。他不仅目睹了孙中山在重病之中仍为国事操劳的感人情景,而且是最先得知孙中山临终遗嘱的当事人之一。从那时起,他决心以孙中山的遗嘱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为实现孙中山的遗志,更积极地投身到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去。

孙中山逝世后,王昆仑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治丧工作,备极辛劳。他在1925年4月去日本考察,5月中旬回到北京。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北京,王昆仑在北京高校学生中组织“沪案雪耻会”,并参与组织了北京6月3日、6月10日、6月25日三次大游行。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人民于天安门举行的为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的罪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上,王昆仑是大会的指挥者之一^①,上了段祺瑞政府通缉的黑名单。

“三·一八”惨案后,王昆仑南下革命浪潮汹涌的广东。当时,广东国民政府正在积极准备北伐。王昆仑到黄埔军校潮州分校^②任政治部总务科长兼政治教官,被授予中校军衔。他还担任了潮州分校主办刊物《潮潮》周刊的主编。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0月15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电令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任命江董琴(国民党左派)为东路军

^① 王朝柱:《王昆仑》,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② 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是1925年冬成立的。黄埔军校长蒋介石兼任该校校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该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熊雄、恽代英、肖楚女等均兼任该校政治教官。

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这时,王昆仑在东路军政治部做机要工作。25日,王昆仑随东路军进了南京城。26日,蒋介石任命吴稚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为副主任。王昆仑被任命为总政治部秘书长。不久,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

这时,王昆仑只有25岁。他虽然热心革命事业,并坚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由于他本人缺乏政治经验,加之受到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学界泰斗蔡元培,以及黄埔军校代理校长、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等人的影响,态度也由原来的联共转向了分共。但他反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时,他已进入了国民党的上层,能更清楚地了解蒋介石集团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独裁统治的一些内幕,因而对国民党反动集团日益产生了怀疑。

思想上的新生

王昆仑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横十分不满,他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其他领袖人物身上。1927年9月16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操纵的“特委会”在南京成立,王昆仑的精神为之一振。不久,王昆仑因是何应钦指挥的东路军的要员,便成了由汪精卫等8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委员之一^①。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在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又当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使王昆仑大为失望,他辞去了国民党内职务。他认为国民党必须加以彻底改造,才能获得新生,而要彻底改造国民党就必须既反蒋又反汪,而拥护胡汉民、孙科上台。于是在1928年2月,与钟天心、谌小岑等人发起组织“再造社”。在李济深的资助下,王昆仑在上海创办了《再造旬刊》,并任主编。在

^①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03页。

《再造旬刊》上王昆仑公开发表了他以孙中山五权宪法为根据设计的政治改造方案和党务改造方案,其基本内容是:排斥汪精卫,抑制蒋介石的独裁,造成蒋、胡分掌军权、党权,并以党权制约军权的政治格局。9月,胡、孙都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再造派的许多骨干分子也纷纷进入南京政府当了官,再造派的活动也就停止了。此时王昆仑并未到南京担任什么实际的职务,而是以在野之身来往于沪、宁、锡等地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的社会活动。此外,他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认真研究革命理论书籍,二是同进步青年交往。

1928年9月以后,王昆仑在无锡太湖别墅中的“方寸桃园”和“松庐”研读了许多革命书籍。其中有吴念慈重新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著的《史的一元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蔡元培题词的李季著的《马克思传》^①。

在学习革命理论和对中国当时社会状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他思考着如何才能使自己更好地报效祖国,而不致成为官僚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工具。与此同时,他还广泛地接触了上海、南京和无锡等地的进步青年,并同他们经常举行座谈讨论,把自己思考的问题告诉他们。这批进步青年以后大都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于南京汤山。此后王昆仑的反蒋情绪更加强烈,积极参与在广东召开的国民党非常会议和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的活动,并担任广州国民政府机关报《中华导报》主编^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被迫下野,孙科当了行政院长。王昆仑本期望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三个文人巨头联合起来反蒋,但使他大为失望的是,胡汉民并不支持孙科。这使王昆仑对国民党的统治及其派系斗争有了新的认识。从此,他表面上虽与胡汉民、孙科等人仍比较接近,但他在思想上却已开始倾向于国民党内的左派和民主派,并积极寻找新的领导革命的力量。

^① 这些书均陈列于无锡王昆仑的故居七十二峰山馆内,书上署名“鲲”。

^② 王朝柱:《王昆仑》,第87页。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中,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镇压爱国学生运动以及学生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促使王昆仑从思想上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彻底决裂。1932年3月,王昆仑在他署名为“大鱼”的文章中,以笔录几个经常在一起的朋友讨论问题的形式,借“H”之口说:“无奈我们的党都已成为军阀政客贪官污吏的大集团,变成了欺骗民众——近来并且亲手屠杀民众的总机关,总而言之是一个民众革命的对象。”“我要去发现新的革命、新的人生,我必须去找真的群众的安慰。”^①王昆仑在这篇文章中虽未公开喊出推翻国民党的口号,也未直接表明拥护共产党,但其思想倾向已十分清楚的了。

通过对国共两党的比较,王昆仑认识到中国真正的希望之所在,对共产党产生了热切向往的感情,并渴望成为一名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

创办《人报》

淞沪抗战使淞沪铁路运输暂时中断,上海的报纸无法到达无锡,王昆仑和孙翔风(时任《国民导报》总编辑)等议定立即创办一份报纸,并拟由孙提出计划,由王筹措开办费。大家一致认为:报纸不只要报道抗战消息,还要写些文章鼓励人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救国。在讨论报纸名称时,王昆仑提出:“法国国有《巴黎人报道》,是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可以称‘无锡人报’”^②。讨论结果,决定把这份报纸定名为《人报》。经过王昆仑的积极争取,在孙科的暗中支持下,《人报》这张两开两版的报纸,终于在淞沪抗战激烈进行的1932年2月26日出刊了。

《人报》社长龚念劬(龚是王的表兄,代表王),副社长孙翔风。《人报》每月亏损150元左右(相当于150块银元),这笔亏损款项由王昆仑

^① 王昆仑:《战争、政治、人生之四——干革命的人们》,《人报》1932年3月20日第2版。

^② 孙翔风:《关于〈人报〉的若干回忆》,《无锡文史资料》第14辑,无锡文史资料研究会编,1986年7月版,第48页。

负责筹措。《人报》从4月4日起扩大版面,改为两开四版,并发表了经王昆仑最后核定的《〈人报〉宣言》。宣言宣布《人报》的宗旨是张民意,扫专制,御外侮,表达了王昆仑和《人报》同仁为实现这一宗旨而决不在任何压力下屈服的坚强决心。

《人报》开办后,王昆仑不顾个人安危,往返于上海和无锡之间,写下了大量的关于战场消息的报道社论,歌颂抗日将士,抨击蒋介石、汪精卫的卖国罪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贪婪和残暴。

他在《致有力无处用的朋友》的社论中说:“我们要研究:怎样才能把这些想用无处用的力量集中,而最后把这些力量用到哪里去?”^① 他在《问无锡青年》的社论中大声疾呼:“起来,无锡的青年;看一看今日之世界需要怎样的无锡,今日的无锡又需要怎样的青年!”这篇社论在当时宁、沪、锡等地的青年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32年5月10日,王昆仑在《人报》上又以“戡天”为笔名发表了《请注意外交当局挨打》一文,猛烈地抨击了蒋介石、汪精卫卖国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指出这种卖国行径无异于当年的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势必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并指出对外抗日到底,对内争取自由,是中国军队和人民的真正任务。

1932年6月初,蒋介石强令抗日有功的十九路军开赴福建“剿共”前线。王昆仑迅速在《人报》上发表了《送别十九路军兵将》的社论,期望十九路军将士:“第一,勿忘了并未完成的抗日使命”;“第二,坚持反对内战的主张”;“第三,认清入闽的意义并非剿匪而为安民”^②。社论还明确指出,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发动的一切内战,都是为了消灭异己和争夺地盘。1932年3月,王昆仑在《人报》上发表的《近时政幕之透视》^③一文,毫不含糊地指出蒋介石是断送东北三省的罪魁祸首,也是断送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罪魁祸首,尖锐地批判了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不惜对外妥协退让,而把军力用于“剿共”

① 大鱼:《致有力无处用的朋友》,《人报》1932年3月8日第2版。

② 戡天:《送别十九路军兵将》,《人报》1932年6月4日第2版。

③ 戡天:《近时政幕之透视》,《人报》1932年3月17日第2版。

和对待地方实力派的卖国行径。

针对国民党政府向人民搜刮各种苛捐杂税,并公然拿保护防洪大堤堤工所应得的堤工费扩充军备和中饱私囊,致使湖北江堤失修,洪水泛滥危害人民的情况,王昆仑愤怒地指出:“今年先大水而来吃人的漫天杂税,遍地的烟苗,广东军阀的火拼,到处军阀官僚豪绅地主买办阶级千方百计向着吃白泥啃草根而不得的老百姓,敲吸那剩余的一张薄皮两根枯骨!总之,今日之中国,洪水横流猛兽横行的世界罢了!”他号召:“驯服的奴隶们,起来,瞪起来你的双眼,握紧你的双拳!漫天遮地的洪水,张牙舞爪的猛兽已经扑到你身上来了,只有自己救自己。”^①

王昆仑这一时期的文章还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列强。针对1932年6月英、法、德召开的洛桑会议,王昆仑著文指出:谁都晓得国际上的缩减军备会议,只是帝国主义国家代表们一面在会场上相继表演着“人道”、“和平”的有声电影,一面又各自在幕后拼命剥削国内无产阶级,侵榨弱小民族,以增加军费预算,扩充陆海空军。因此,“这种会议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多开一次多增加一次纠纷,多暴露一回裂痕而已,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都是二次大战前夜的徵象。”文章最后指出:“我们中国人以及全世界被压迫者所应认清的国际帝国主义已走到了由火拼而入崩溃的阶段,我们全世界的被压迫者应当赶快起来促其早日灭亡。”^②

这一时期,王昆仑还在《人报》上发表过一些杂文,内容涉及到文艺思想、人生观以及男女关系、妇女解放等理论与社会问题,并在上海《晶报》等发行量很大的通俗小报上发表了许多通俗生动的杂文,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以及国民党反动集团的丑恶行径。

王昆仑还以很大的精力对青年进行团结教育工作。他经常与进步青年一起研究革命书籍,一道分析时局,曾在《人报》上连续三次发表了他与无锡青年座谈讨论活动的内容。

① 戴天:《洪水横流与猛兽横行》,《人报》1932年7月2日第2版。

② 戴天:《洛桑会议与军缩会议》,《人报》1932年7月8日第2版。

组织“读书会”

1932年11月,王昆仑因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的提名而担任了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以后便常住南京。这时,他除了与《人报》保持密切联系,与沪、锡、宁进步青年保持广泛接触外,还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进行抗日反蒋活动。与此同时,王昆仑积极设法寻找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33年初,王昆仑向其好友左恭郑重提出,请左帮助他寻找共产党(左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当时王昆仑并不知道)。

当时,卢志英任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上级党组织给卢的任务是恢复党的南京市委和各级基层组织,并设法打进国民党的心脏部门,取得军事情报^①。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并请示上级党组织的同意,卢志英亲自做王昆仑的工作。第一次长谈是在南京王昆仑的寓所进行的。此后,卢志英又多次找王昆仑谈话,王多次向卢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经请示中共中央批准,由卢志英介绍,王昆仑于1933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王昆仑就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不顾个人安危,成为战斗在国民党高层内的一名特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王昆仑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有意识地与一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将领交往,一方面获取国民党上层方面的军政信息,一方面做推动这些人参加抗日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王昆仑不仅向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而且对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思想转变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方便从事地下工作,王昆仑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租了一套寓所。每隔一两个星期,王昆仑就从南京来到上海,与上海中央组织指定的有关党员联系。王昆仑与中共组织的联系有些是心照不宣的,比如与艺术家金山(中共秘密党员)的联系,有些则是直接与自己的领导人卢志英等联系。

王昆仑入党后,开始酝酿以读书会的形式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以

^{①②} 卢大容:《我的父亲卢志英烈士》,《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第77页。

培养抗日救亡活动的骨干。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王昆仑在“万方多难”的情况下,在南京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把这一情况向卢志英汇报后,卢不赞成,认为政治色彩太浓,建议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读书会”。同年秋初,王昆仑在孙晓村的帮助下,正式发起组织了“读书会”,会址就设在南京成贤街无锡同乡会(王昆仑寓所)里。读书会刚成立时,有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胡济邦、王枫、勾适生等六人。不久,又吸收了吴茂荪、吴元戎、汪季琦、顾清侣、张锡昌、秦柳方、袁秩群、薛宁人、孙克定、华应申、狄超白等人。

读书会定期进行国际国内形势分析,有计划地组织成员阅读《唯物辩证法入门》,李达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并以河上肇《经济学大纲》以及《读书月刊》、《世界知识》等书刊作为辅助读物^①。在读书会中,王昆仑着重从事形势分析,“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阴谋。”^② 1934年,薛葆鼎、汪德彰、季洪、千家驹等人加入了读书会。这时,除了成贤街王昆仑寓所活动的一组外,还分别在中央大学、政治学校、金陵中学等单位建立了读书会小组。

读书会组织的扩大,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特别是在国民党的政治学校发展读书成员,更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因而读书会成员顾清侣等人曾遭逮捕(后经王昆仑通过上层关系营救出狱)。

南京读书会由吴茂荪出面,于1934年春季到秋季在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主办的《新民报》上办了副刊——《时代认识》,共出了19期,在南京的知识分子中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③。读书会部分成员在南京还参与创办新知书店和狄超白主编的《通俗经济学讲话》的编写工作。

中共南京地下组织没有直接出面领导读书会,但当时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顾衡(与王昆仑是无锡同乡)经常过问读书会的情况和工作,并提出指导意见,一些中共党员在读书会中起了骨干作用。

在王昆仑的支持下,原南京读书会的成员张锡昌1934年在无锡组

① 薛葆鼎:《关于南京读书会的情况》,《南京党史资料》1986年第4辑,第10页。

②③ 孙晓村、汪季琦:《南京读书会和南京各界救国会》,《南京党史资料》第3辑,第73页。

组织了读书会。同年,王昆仑与中共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曹亮也建立了联系。

1935年5月《何梅协定》签订后,华北危机进一步加深。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上海担任塔斯社记者的钱俊瑞,在电台上收听到“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报告,立即向中共上海“文委”作了汇报。在上海“文委”推动下,宁、锡读书会与上海救国会筹备会的领导人决定在无锡太湖“万方楼”召开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会议。“万方楼”是王昆仑之父于1933年建成的,是座落在无锡太湖72峰山馆西下坡的一座三层小楼。王昆仑目睹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遂取意于杜甫《登楼》诗中“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的名句,命名这座楼为“万方楼”,并请国民党元老经亨颐题写“万方楼”三字悬于大楼正门之上。1935年8月底,南京、上海、无锡三方的救国会读书会才俊相继来到这里。会上,由“文委”的钱俊瑞作了政治报告。他着重指出当前形势的关键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超过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今后工作方向是贯彻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介绍了沈钧儒等在上海的活动情况。之后,由王昆仑分析了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情况;孙晓村、曹孟君介绍了南京读书会的社会活动情况;曹亮讲了各方面应怎样进行联系等等^①。

万方楼会议使与会者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当前的奋斗目标,在这次会议上,王昆仑、曹孟君、孙晓村等接受上海意见,以南京读书会为基础,筹备“南京救国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南京如何工作”,也讨论了“要不要提反蒋”和“如何争取合法公开”等问题^②。

王昆仑经常去上海进行抗日反蒋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但戴笠等人因抓不到把柄,只能对王昆仑在南京、上海、无锡等地的行踪进行严密监视,以便伺机下手。在“万方楼”会议召开之前,戴笠

① 孙晓村、汪季琦:《南京读书会和南京各界救国会》,《南京党史资料》第3辑,第74页。

② 钱俊瑞:《无锡万方楼会议前后》,《南京党史资料》第11辑,第3页。

命令军统特务系统上海法租界组长沈醉带领 12 名特务,分三批先后到无锡侦察、布置,准备在“万方楼”会议期间,一旦抓到证据,便对王昆仑下毒手^①。但由于他们无法摸清“万方楼”会议的内容及与会成员的真实政治身份和背景,加之王家在无锡一向受到当地士绅和群众的尊敬,王昆仑在国民党内又是立法委员,与孙科关系密切,便未敢轻举妄动。

“万方楼”会议后,南京读书会成员回到南京,立即着手成立南京各界救国会的筹备工作。1935 年秋季以后,南京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职工救国会先后成立,并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王昆仑同各界救国会中的领导人孙晓村、王枫、薛葆鼎、狄超白、曹孟君等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南京各界救国会的幕后主要领导人。

在此期间,王昆仑还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特殊身份和关系,营救了一些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

联络各方抗日力量

1935 年 11 月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王昆仑依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通过“竞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这样他就具备了在国民党高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的更有利的条件。他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元老、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内的正直人士以及各地方实力派。他积极推动这些人积极投入抗日活动。

1936 年 4 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冯雪峰到上海,很快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并提出为建立一个秘密电台筹集经费^②。王昆仑得知这一消息后,便主动承担了为电台募集资金的任务。这是一笔数目很大的资金,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王昆仑想到了刘湘。刘湘是地方军阀,蒋介石叫他来南京,他不敢不来,来了又怕被软禁,总想在蒋介石政府里多找些关系。因王昆仑背后有孙科,刘湘

^① 沈醉:《我这三十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版,第 156 页。

^② 冯雪峰:《冯雪峰文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 506 页。